

《说文》与训诂研究论集

宋永培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说文》与训诂研究论集

宋永培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与训诂研究论集 / 宋永培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8822-0

I. ①说… II. ①宋… III. ①说文—文集 ②训诂—文集 IV. ①H161-53 ②H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406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说文》与训诂研究论集

宋永培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822-0

2013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frac{3}{4}$

定价:36.00元

目 录

“训诂”的本义与“六经皆史”的内涵

——为纪念导师陆宗达先生九十诞辰而作·····	1
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训诂研究·····	17
论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的根本观念·····	31
陆宗达、王宁先生学术的渊源、传承与发展 ·····	40
训诂方法新论 ·····	59
文献正文的训诂与专书词汇研究的基本方法 ·····	74
训诂材料的综合与词义的具体所指 ·····	86
汉字古形古音古义体系的研究与前闻六经 ·····	93
《说文》对上古汉语字词的系统整理·····	107
《说文解字》词义系统研究(提要)·····	117
论《说文》中单个词的词义系统·····	137
从《说文》词义系统论证“拯溺”“濒附”“付受” “丨通”“舟旋”“恒长”“匝遍”等义的本源及其联系·····	153
从《说文》词义系统论证“舟輿”“上举”“栋极”“造就” “登进”等义的本源及其联系·····	173
从《说文》词义系统论证“水厓”“崩陨”“危高” “惶惧”等义的本源与联系·····	187
论《说文》意义体系的内容与规律·····	219

2 《说文》与训诂研究论集

《说文》意义体系与成体系的中国上古史·····	239
从《说文》词义系统探求古代社会统一	
多于分裂的思想依据·····	265
《说文》与文献词义学的发展·····	279
《说文》对反义同义同源关系的表述与探讨·····	306
对《说文段注》有关“引申的系统性”论述的整理研究·····	323
对《说文段注》有关“引申规律”论述的整理研究·····	335
论陆宗达、王宁的《说文》意义之学 ·····	353
《诗经》、群经的贯通研究与诗义考释 ·····	372
《左传》“度”“制”“法”“量”“守”的联系与内涵·····	384
《论语》“民”“人”的实际所指与词义特点·····	391
《文始》“京”字条评注·····	431
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本义·····	439

“训诂”的本义与“六经皆史”的内涵

——为纪念导师陆宗达先生九十诞辰而作

“训诂”这个词的意义，今人理解为“解释古代词义”。这种理解只是“训诂”一词在后来的基本意义，不是它本来的意义。这就容易导致对于“训诂工作”的本来意义的误解，从而妨碍我们对于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任务、目的的正确认识，并影响现代、当代训诂学的建立与发展。

“训诂”的本义是什么呢？潘任《说文粹言疏证》（《希郑堂丛书》本）说：“训诂之名始于《大雅·烝民》‘古训是式’。毛传：‘古，故也。’是即训诂之义。‘故、诂、古’三字通。《尔雅·释诂》释文引《字林》曰：‘诂，故言也。’又云：‘诂本作故。’《说文·言部》：‘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引‘《诗》曰诂训’。是《诗》之‘古训’当作‘诂训’。‘古’与‘故、诂’音义俱同。”潘任的这个说法，同于钱大昕的见解。《段注匡谬》是这样引用钱大昕的见解的：“许氏引书，往往不举全文。‘诂训’即‘古训是式’。善读书者，融会全书，知其体例，不为孟浪之言，不以‘《诗》曰诂训’为不成语也。”潘、钱二家的说法中提到了《说文》对于“诂训”本义的解释。《说文》的解释是：“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诗》曰诂训。”（三上）

对于《说文》这条解释不能理解为“诂，训故言也”，而应明确

“诂”和“训”连接为一个词“诂训”。这体现了《说文》的一个基本条例——连上篆为句。钱大昕《〈说文〉连上篆为句》^①指出,《说文》的“诂”字应与“训”字连读为“诂训”：“许君因文解义,或当叠正文者,即承上篆文连读,如:‘诂训,故言也。’”

我们现在见到的大徐本《说文》把“诂训”解释为“故言”,但是《说文》的古本也有把“故言”直接写作“古言”的。这有以下证据:《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引用《说文》时,写作“诂训,古言也”。《后汉书·桓谭传》:“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注引《说文》为“诂训,古言也”。《后汉书·郑兴传》:“使撰条例章句训诂。”注引《说文》为“诂训,古言也”。

由上可知:“古训”就是“古言”。而“古言”又叫做“古道”。所以对于《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毛传解释为:“古,故。训,道。”于是孔颖达正义解释说:“古训者,故旧之道。”^②

需要明确的是:“训、道”是同义词,其本义(言语,道理)的词性是名词。由于古言、古道需要通过阐说来推广,需要解释才能理解,所以“古言、古道”的“言”与“道”就引申出“阐说、解释”的意义,这种引申义的词性成了动词。“训诂”的名称与本义本来是“古训、古言、古道”,这种上古的“古训”到了后代已经不容易为人理解,必须加以解释,因而“古训”(古言、古道)就产生了“解释”的意义。在字形上也随之发生变化,变化的程序是:古训——故训——诂训——训故——训诂。在这些词的字形中,“古、故、诂”的形、音、义彼此联系贯通。其中,“故”发挥了中间环节的作用,在意义上它既含“古代”义,又含“老旧”义,又含“解释”义。在词性上它既是名词,又是形容词,又是动词。这样的语言例证是很多的。例如:在毛传的解释“古,故”中,“故”是名词,义为“古代”。在孔颖达的解

释“古训者，故旧之道”中，“故”是形容词，义为“故旧”。在《汉书·艺文志》“《诗》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中，“故”是动词，义为“解释”。

从汉代至今，后人对上古的古训的理解必须经由解释这个阶段，所以“训诂”就引申出并固定为“解释古训”即“解释古代词义”这样的基本意义。它的本义——“古训、古言、古道”倒逐渐被人们淡忘和忽视了。但是，中国的学术文化是一脉相承地灌注下来的，既然要研究训诂，那么“训诂”的本义是一定淡忘、忽视不得的。

现在把问题重新引到上文所说的“训诂”的本义上来，并且深入地探寻：“训诂”的本义——“古训、古言、古道”，指称什么内容，具有什么特点呢？

《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笺云：“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正义：“古训者，故旧之道，故为先王之遗典也。”^③“先王之遗典”，表述的是“先王之陈迹”。这些上古的遗典、陈迹，流传到春秋战国时代，其中一部分便沉积于“六经”之中。所以《庄子·天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上古”的时限，可以一直上溯到远古时期。先王的遗典（古训）和先王的陈迹，是从距今约六千年的尧舜时代发端的。

《说文·叙》简要勾勒了尧舜时代“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的古史概况。在《说文》意义体系中，这种古史开始于“民居水中高土”的“尧遭洪水”事件。先民为避洪灾而由水登山，在山陵高土仰观俯察，田猎农耕。其时书契初兴，“百工以义，万品以察”。书契不但表述了由水登山、田猎农耕的历程，也记录了平治洪水之后，降丘宅土、经纬九州的史实。

章学诚《校讎通义·内篇原道第一》中，谈到了文字产生时，

“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的特定的方式与体制。他说：“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义，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这就是说，在尧舜时代，百官通过文字来治理政事，万民凭借文字来察知事物。这种治理与察知的特定体制，是“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简言之就是“官师合一”。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即：官吏既担任“治民”之职，又掌管“教民”之事。“治、教”之责，“官、师”之务，都集中于官吏之身。这样一来，著述就出自于统一的“官”与“师”，“官、师”著述的内容就等同于学士学习的内容，便是表述尧舜以来百官治理的史实和万民察知的事物，以及在这种治理、察知之中形成的典章制度与文化观念。

上古时代，政治、文教上“官师合一”的特定体制是与学术文化上“道器合一”的特定形态密切联系的。“官师合一”是说官吏集“治民、教民”的职责于一身。“道器合一”则是说古道、古训都寄寓在对实事的陈述中。“官师合一”既然密切联系着“道器合一”，就表明当时的“官、师”是用和谐结合的“道、器”来治理与教化民众的。道，指概括了的事物的特点与规律，因而是应当效法的形而上的道理、原则。器，指生动具体、为人熟知的形而下的实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依托于具体的事物“器”才能存在，事物的特质只有通过“道”的概括才能彰显。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正是在这种特定的“道、器”的密切结合中开辟出

后代学术文化的远流来的。章学诚深明此理,他的《文史通义·外篇卷三》深刻地指出:“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实古今学术之要旨。”

至此可以看到,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国的古训、训诂,它们在一开始即造就了自己根本的特点,就是最为注重这种“惟精惟一”的结合:“官师合一”,“道器合一”,用“官师合一”来制定和推行“道器合一”。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说:“中国的早熟文化”,“中国的文明正如同东方升起的光明灿烂的太阳,驱散宇宙间的一切云雾,成为光天化日的世界。这在其他文化中是需要长时期的演变才能达到的”,“在《尚书》这部古书中,中国人在精神上最佩服、最醉心的是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就出现了大太阳,成为彻上彻下的理性世界”^④。

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之所以美善与辉煌,是因为它记录与阐释了如同《论语·泰伯》所深情赞颂的“大哉尧之为君”的“成功”与“文章”。“成功”是指尧带领民众由水登山、田猎农耕、平治水土、经纬九州的丰功伟业,“文章”是指尧与民众在创建如许功业中概括与发扬的“一生万物,万物合一”的观念体系与“生生之谓易”的创造精神。所以《泰伯》篇盛赞尧的“成功”是“巍巍乎”!尧的“文章”是“焕乎”!确乎其不可拔的是“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孔子衷心歌颂“大哉尧之为君”(《论语·泰伯》),表明中国的君王是从尧开始的。《白虎通·号》篇客观而又深刻地揭示“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表明尧是以自己为民忧勤垦殖、经纬九州的

盛德大业赢得群众归心，而成为万方景仰的人君、先王的。

“古训”与“六经”所载“先王之陈迹”“先王之遗典”，主要的就是尧的盛德大业，以及从中提炼、升华而出的观念与精神。我们认为，这才是“古训、训诂”的本来意义，这才是“六经皆史”的真实含义。正如章学诚《丙辰札记》（见《章氏遗书·外编》卷三）所说：“古无经史之分，圣人亦无私自作经以寓道法之理。六艺皆史之遗，后人不尽觉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

这样渊深宏大、充实光辉的盛德、功业、观念、精神，有幸以“道器合一”的精妙形态寄寓于尧舜时代的古训、古道中，而这种古训、古道又通过“官师合一”的特定体制广泛而深刻地推行于尧舜时代、夏商周时代。无论是官师还是民众，都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亲切而愉悦地学习与遵从这种古训、古道。于是由尧舜时代相沿而下，不期然地形成了一个规范，一种传统，就是遵从古训，并强调遵从古训的重要。

《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毛传：“式，法也。”疏：“遵法而行之。”^⑤

可知“古训是式”的含义，就是强调遵守古训。

《尚书·兑命》：“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注：“学于古训，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训而以能长世，非说所闻。言无是道。”^⑥

《尚书·吕刑》：“若古有训。”注：“顺古有遗训。”^⑦

《论语·述而》：“信而好古。”宋翔凤《论语发微》：“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此“信而好古也”^⑧。

《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当尧舜时代演化为陈迹，“官师合一”的政治、文教体制消逝之

后,人们就更加注重对于“道器合一”的传统学术文化的崇奉、研习与传播,但此时已不是采用“官师合一”的体制,而是运用多种方式来崇奉、研习与传播了。汪中《述学》论说了这种方式的发展变化过程。他说:“当时(虞夏至成周)行一事则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闵久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自辟雍之制无闻(辟雍之制的确立,辟雍教学与记载的内容,都是直接表述与纪念尧遭洪水、禹治洪水的史实——引者注),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旧则犁然俱在,而历世既久,徒以沿袭失之,而不能复知其制作之义。孔子则眷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诸当世,故云‘人存政举’,又曰‘待其人而后行’。庄子则一以为无用而思欲尽去之。”“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之所掌,荡然无存,而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

从汪中《述学》的论说,可知古训、训诂的存在方式与变化方式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唐虞至成周——古训存于官府。

周衰至列国——古训存于学士、大夫。其时诸子各以其学鸣,诸侯纷纷废弃经籍。古训由于学士大夫的传授整理得以废而不失。

秦政焚书——官府掌守的古训荡然无存,古训由于学士相传而存其一二。

汉儒注经——主要从故老和通人的口头搜求古训;在汉代惠

帝撤除挟书之律、文帝景帝渐开献书之路后,逐渐转向用古文经学解释经书的意义。当时最重要的事件,除了郑玄融贯今古文经学,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贾逵修理旧文,对于“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⑧;二是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许慎不但是汉儒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五经无双许叔重”),也是唐虞以来悠悠古训的集大成者。在认识了“古训、训诂”的内容与特点,清理了“古训、训诂”的产生、发展、废失、复生的历程之后,我们就明白了:

——尧的古训、古道奠定了中华民族慈仁体物、专默精诚的禀性,开辟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先河。这种古训、古道在千载巨变中不论经历怎样的放失、涤除与沉积,它总能够周而复始地得到整合、重光与新生。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尧的古训、古道的每一次整合、重光与复生都首先体现为对这种古训、古道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性解释。每一次解释虽然不能完全如实地再现尧的古训、古道的真面目,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尽力追求着对于古训、古道的回归与认同。所以,关于“训诂”这个概念的发生,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为是由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如明代陈第所言),或者表面化地理解为是由于“秦火之后,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如清代戴震所言)。只有从中国历史与学术文化的起点,考察或推求尧舜时代古训、古道的形成及其存在形式和本来意义的演变,才能找到“训诂”必然复生的根本原因。

——尧的古训、古道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整合、重光与复生是处在周衰至列国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作为“解释古代词义”的“训诂”的萌生期。以往的训诂学专书与文章

把“先秦”划定为训诂萌生的时期。这个“先秦”的时限,说得还比较笼统,应当确切地划定为是在周衰至列国时期。并且,以往的训诂学专书与文章也没有考察为什么“解释古代词义”的工作要萌生在此时。这个时期的现状是“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就是说,唐虞、夏、商、周世代相传的“官府之典籍”“浸久而遂亡”,人们已“不能复知其制作之义”,于是“故老”口耳相传,“好古君子”“书之简毕”,由此而产生了“学士大夫之典籍”(见汪中《述学》)。孔子,就是这种“好古君子”中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他整理删订的“六经”,是“学士大夫之典籍”中最能显示唐虞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内涵之美富的巨制。孔子的目标,是祖述与解释尧舜的古训、古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孟子,则大力宣传和发挥孔子祖述的尧舜古训。这在古代文献中,是有很多例句证明的。例如:

《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

《盐铁论·大论》:“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孟子·公孙丑下》:“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孟子·离娄上》:“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上》:“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孟子·离娄上》:“皆法尧舜而已矣。”

《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孟子·告子下》：“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以上表明，在周衰至列国时期，训诂萌生的实质是对尧舜的古训、古道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先是孔子，其后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孟子。

——以孔子、孟子为创始人和杰出代表对尧舜的古训所作的第一次大规模解释，不仅促成了作为“解释古代词义”的“训诂”的萌生，而且奠定了此后“训诂解释”的原则与方向。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与战国时代的学者和汉代的注释家相比，孔子掌握尧舜、夏、商、周的史实与观念更多些，对这些史实与观念认识得更深些，并且孔子距离尧舜、夏、商、周的时代更早些，更近些，他从上古的史实和观念出发来解释尧舜古训，所以采用的方式能使得人们便于理解，也乐于理解。《说文·三上》总结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解释方式，于是给“训”下的定义是“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⑧《说文·三上》：“说，说释也。”段玉裁注：“说释即悦悻，说悦、释悻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悻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⑨“说释”即是“悦悻”，就是愉快地去理解，或者说便于人们在愉悦中自然地得到理解。最早的上古史实是尧遭洪水、禹治洪水。古训、故训之“训”字，从言，川声。“川”是“贯穿通流水”（《说文·十一下》），它直接记录“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这样的情景。当初的洪水是

“水不遵道”，是泛滥。而大禹治平的河水是“遵道而行”，是顺遂。尧舜古训的“训”字就是为了表述经过平治之后“贯穿通流”的河水顺遂而行这样的史实、景象而创制的。可是，从尧舜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又经过了两千余年，此时“辟雍之制无闻”，唐虞、夏、商、周世代相传的较多的典籍“浸久而遂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追思与理解尧舜古训，诸多古训的语义便成为人们认识上的障碍了。这就要“顺着”古训的语义发展演变的脉络，把从尧舜到春秋战国这两千余年中国语义变化所造成的障碍加以“贯通”。《说文》云：“毌（即今之“贯”——引者注），穿物持之也。”（七上）“疏，通也。”（十四下）“彻，通也。”（三下）“贯”“疏”“彻”在意义上的共同点都是指把阻塞贯穿起来，从而彻除这些阻塞。所以对于古训、训诂，在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中都是讲一个“通”字，即所谓“通训诂”。例如：

《汉书·扬雄传》：“训诂通而已。”

《尔雅·释诂》郭璞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

孔颖达《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正义》：“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陈澧《东塾读书记》：“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

贯通训诂的方式是什么呢？是“顺遂”。因而古训、训诂的“训”字，其意义特点是“顺”。这在古书中也是有诸多例证的。例如：

《诗·大雅·抑》：“四方其训之。”其中的“训”字，《左传·襄公

二十六年》引作“顺”。

《广雅·释诂》：“训，顺也。”王念孙《疏证》：“训、顺古同声。”

《说文系传》：“训者，顺其意义训之也。”

《说文·三上》：“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

这种顺遂地贯通训诂的方式，在孔子、孟子第一次大规模地解释尧舜古训的时候，是直接取法于当初大禹平治洪水的方式的。《孟子·离娄下》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所谓“行其所无事”，是指顺着水的自然走势去疏导它。这里的关键，就是讲“导”。因而《孟子·告子下》又把“禹治水”称为“水之道”：“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五：“水之道犹云水之路，谓水所行之路，而禹顺导之耳。”^⑩可见，“顺遂”的方式，就是“疏导”的方式。焦循用“同义连文”的格式来运用“顺、导”两词，表明“顺”和“导”是同义相通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古训、训诂的“训”字，其意义特点既可以表述为“顺”，又可以表述为“导”。这在训诂专书中是有例证的。例如：

《尔雅·释诂》：“训，道也。”（“道”包含“导”义，后分化出“导”字）。

《一切经音义》五：“训，导也，教也。”

《一切经音义》二十二引《说文》作：“训，导释也。”

在《说文》意义体系中，“通”“迥”“达”“道”（“道”分化出“导”字）“顺”都是同义词。《说文》意义体系表明，汉语字词的本义，大多是直接而具体地表述洪水事件的。到了后来，才被假借而指称其他事物或抽象的概念。“通”“迥”“达”“道”“顺”最先是记录夏禹